

本期专题·改革红利

编者按：国务院一个月出台8项重要政策着力释放改革红利。

国务院于7月15日公布了上半年经济数据，GDP增速滑向“下限”，此后，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政策密集出台。

据统计，仅自7月20日至8月20日一个月的时间里，国务院先后推出了放开贷款利率管制、月销售额不超2万元企业免征两税、“营改增”试点扩至全国、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促进信息消费、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宽带中国”战略、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等8项重要政策措施。这一系列改革措施具有“长短结合”的特点，兼顾稳增长和调结构，体现出了新一届政府“向改革要红利”的意图和决心。

今年是深化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一年，在经济增速回落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走向何方？什么将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中国经济又如何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同时，对于近期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会对企业、百姓生活产生何种影响？下半年金融、财税等领域改革如何推进？房地产调控如何走出“屡控屡涨”困境？新型城镇化道路如何推进？审计地方债如何标本兼治？这一切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

一切靠改革。何为改革红利？改革红利还能吃多久？还能吃多少？本刊特此推出“改革红利”专题，新盼引起您的兴趣。当然，其他栏目推出的文章也值得一读。

- 02 李克强为新设行政许可立规
“三个严格”体现政府决心
- 03 谢春涛解读“改革红利”
- 05 迟福林解读改革红利的释放
- 06 未来中国消费打头阵 改革红利待加速释放
- 07 “改革红利”三题
- 09 改革红利让小贷公司成为海外资本市场新宠儿
- 10 王健林：
中国吃邓小平改革红利已经25年 红利快结束了

国是论衡

- 11 干部穿好“三双鞋”才能服务好

政坛经纬

- 12 李瑞环总结30多年从政经验
对做官的“看法与说法”

八面来风

- 18 媒体揭秘给中央领导信件如何进中南海

悦读时光

- 封三 “何以解忧，惟有改革”（一）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臧 科
主 编：刘 进
责 编：周玉奇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961988622
邮 箱：75156450@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盐城市圆融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李克强为新设行政许可立规 “三个严格”体现政府决心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8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出台严格控制新设行政许可的措施，再取消一批评比达标表彰评估项目。

李克强总理履新伊始就明确指出，机构改革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并且表态，新一届政府下决心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行政审批。

截至目前，国务院已经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累计215项。今年4月24日、5月6日，国务院先后两次召开常务会议，分别取消和下放了71项、62项行政审批事项；6月19日，又取消和下放了32项行政审批事项；7月22日，国务院再度取消和下放50项行政审批项目。

出台严格控制新设行政许可的措施，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配套措施，也是坚定不移、持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又一重要举措，有利于防止审批事项边减边增、明减暗增，进一步为企业“减负松绑”，激发市场活力，营造公正发展环境。

此次国务院常务会更是明确依法设定行政许可必须做到“三个严格”，让行政审批走出“边减边增”的轮回。

一要严格设定标准。坚决控制新设对企业投资、产品、生产经营和资质资格的行政许可，放宽社会资金准入。能通过技术标准、规范等其他管理手段或措施解决的，不得设定行政许可；能通过设定一个行政许可解决的，不得设定多个行政许可。

二要严格设定程序。对确有必要设定的行政许可，要加强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审查，并广泛听取意见。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得设定。召开听证会要真实反映民意，防止成摆设。

李克强总理反复强调，在转变政府职能、削减行政审批上，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决不允许相互扯皮、推诿拖沓，明放暗不放。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转变政府职能的突破口，是释放改革红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一招，只有坚决的落实好，才能更好的激发市场发展活力和创造力，才能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

(8月22日 中国政府网)



谢春涛解读 “改革红利”

“如果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就容易理解改革红利这个概念了。有两个例子非常典型，一个是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一个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两项改革对中国的生产力发展作用太大了，用这两个例子来说明改革红利，最有说服力。”

“现在的改革比过去更难，大家也都在议论这个问题，为什么更难？就是因为目前的改革很难找到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突破口。比如当年的农村改革，让所有人得利，让所有人叫好。但改革进入深水区，这样的突破口很难再找到。”

访谈者：北京青年报浮言

受访者：谢春涛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并被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聘为客座教授或特约研究员。

什么是“改革红利”？

青评论：什么是改革红利，如何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来看这个命题？

谢春涛：如果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就容易理解改革红利这个概念了。有两个例子非常典型，一个是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一个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两项改革对中国的生产力发展作用太大了，用这两个例子来说明改革红利，最有说服力。

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指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中，生产者对生产的最终成果负责，并按实

现的产量获得劳动报酬的一种生产责任制，也称农业联产计酬责任制。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农民吃不饱饭，而改革至今，现在耕地比以往减少了很多，人口增加了很多，但农民不仅吃饱了饭，而且收入增加，成为中国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我国经济以前发展缓慢，没有动力，搞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市场配置资源，不同利益主体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必然使出浑身解数，活力、压力无处不在。经济发展显然比过去快多了。

“改革红利”提法

有何特殊背景？

青评论：十八大闭幕不久后，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李克强在会上首次提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这一提法，有何特殊的背景和目的？

谢春涛：“改革是最大红利”，这一提法，是国务院对十八大精神的落实，旨在强调进一步改革。十八大定下来了今后五年的工作原则，接下来就是落实。

过去邓小平讲，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从过去的经历来看，改革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充分的、有效的。此次李克强提出了“改革是最大红利”，所谓改革红利是从人口红利的角度转过来的。现在有人认为，中国计划生育搞了那么多年，中国的人口红利降低了，年轻的劳动力比过去相对来讲少了，逐步进入老龄社会了。那么未来人口红利没

有了，以后依靠什么发展？李克强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后要更加依靠改革，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其实，从发展的角度讲，“改革红利”的提法，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一个意思。

改革攻坚有突破吗？

青评论：近年来，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区，但在关键环节、核心领域的改革迟迟不能突破，原因何在？改革是最大红利，中国社会要继续改革，最重要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破口在哪里？

谢春涛：现在的改革比过去更难，大家都在议论这个问题，为什么更难？就是因为目前的改革很难找到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突破口。比如当年的农村改革，让所有人得利，让所有人叫好。但改革进入深水区，这样的突破口很难再找到。当然也有，比如大家认同程度比较高的医改。但总的来讲，不管怎么认同，现在搞的改革，相对来讲都要难。因为改革是利益调整，调整的过程中，可能有人得到更多的利益，有人得到比较少的利益，有人甚至可能不得益。在朱镕基时期的国企改革，一度有人下岗了，他们的利益甚至在改革中受到损害。所以，得益程度不同，就决定了人们对改革会是不同的态度。

目前的情况下，很难说哪一项改革就是个突破口，或者说这项改了，整个改革就活了。现在经常谈论的改革包括，社会保障体制、养老金制度中的双轨制，还有金融体制改革、公车改革等等。需要改的东西很多，有的容易些，有的难，但总的来讲，没有很容易的改革。

中国改革有无路线图？

青评论：从十八大报告以及近期国务院会议，能否看到未来五年，中国改革的总体思路 and 原则是什么？中国改革有无路线图？

谢春涛：中国的改革应该是有路线图的，也就是所谓的顶层设计。以医疗改革为例，医改是我国社会领域的重大改革，涉及民生、事关发展，即直接关系到人民健康，又联系到居民消费、扩大内需，以及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国务院把医改作为

重要抓手，通过三年多努力，医改取得阶段性成果，但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也不少。近期召开的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会议上，李克强的讲话就透露出，改革的总体思路 and 一般性原则。

李克强说，医改实践带给我们许多理念和启示，对经济社会领域其他改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首先，我们说改革是最大红利，其目的就是让广大人民受益。改革必然要触动固有利益格局，重点调整预期利益和增量利益，但最终是要落到人民真正得利益上；其次，改革红利的释放要依靠创新体制、建立机制。要发挥好发展的潜力，财政需要增加投入，但更重要的是在创新体制机制上做文章；再次，改革是渐进式的、累积式的，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也不能踟躇不前，绕着矛盾走。改革既要先易后难，也要不失时机突破重点、带动全局。”

收入分配改革何时推出？

青评论：虽然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贫富差距较以往有所放大。有分析指出，中国社会利益格局扭曲，以分配制度为例，在劳动报酬占比被挤压到非常小的空间，在一次分配已经不合理的情况下，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财政支出占比偏低。

谢春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大家议论了很多年，改革也酝酿了8年，此前人保部称各部门正研究制定有关改革方案，这项改革确实比较难，有关方案也可能在今年两会上出台，也可能会晚些。

收入分配改革中，最直接的就是工资制度改革，其中的问题包括，国企高管收入过高。财政部此前也作出一些规定，但是有一个现实是，收入已经高上去的群体，你让他的收入降下来，是很难做到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往上提，比较容易。各个群体的收入增长的幅度和速度，应该有个大致的平衡，不能让某个阶层涨的特别多特别快，某些人涨得很慢，这个过程收入差别就拉大了。“提低”的重点是提高农民、城乡贫困居民、企业退休人员和低收入工薪劳动者这四类低收入者的所得，其方法首先要努力扩大就业，尤其是要解决低收入家庭的

迟福林解读 改革红利的释放



《法制日报》记者吴晓锋了解到，由迟福林主编的《改革红利——十八大后转型与改革的五大趋势》一书今年2月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已经销售3万多册。迟福林在见面会上向媒体和读者详细解读了如何通过五大转型改革来释放“改革红利”。

迟福林在见面会上为读者介绍了此书出版的背景。迟福林说，中国经济增速目前已进入“快档”向“中档”转折期，未来5到10年，中国经济将从两位数的高增长进入7-8%的中速增长阶段。另外，随着国际上外需明显减弱、劳动力红利明显削减、资源环境约束明显增强，以往中国经济依靠投资出口主导型的增长条件发生明

显变化，产能过剩现象愈发严重，体制机制矛盾更为突出。

“因此，改革不是口号而是现实。”迟福林说，下一步必须要通过加快改革释放发展潜力，维持中国经济的5-10年的中速增长，使得中国经济总量接近美国，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9000美元，为中国经济社会公平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迟福林表示，《改革红利——十八大后转型与改革的五大趋势》主要围绕中国下一步亟待推进的五大改革进行论述。分别是走向消费大国的转型与改革、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形成6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转型与改革、市场导向的转型与改革、以优化权力结构为重点的政府转型与改革。

就业问题。

未来改革

增量还是存量？

青评论：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以增量改革为主，阻力较小。已经迫在眉睫的分配制度改革，显然更主要地是对存量的改革。那么，这是否说明未来的改革，将以存量改革为主？

谢春涛：未来改革不好说以存量改革为主。十七大以及十八大报告，包括中央主要领导近期的讲话，都谈得很明白。什么是改革成功，就是让大多数人得益，改革也因此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所谓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不是绝对的，不

是就这一盘子肉大家来分，于是改革就变成怎么分法的问题。如果是这样，改革就确实很难进行。把一些人已经得到的再切出一块，他们当然不会愿意。

其实，改革就是调整机制。对于必须打破的，比如垄断，是对既有利益的触动，但垄断地位改变后，客观上对整个社会、对老百姓有好处，那么垄断企业的利益就应该打破。但存量改革的目的是，是让老百姓得利，让国家更快发展，不能损害多数人的利益。“改革要触动固有利益格局，重点调整预期利益和增量利益，但最终是要落到人民真正得利益上。”

(文/淳言)

未来中国消费打头阵 改革红利待加速释放

在强调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未来将在国际处于何种地位?发展的动力来自哪里?哪些行业将冉冉升起?

带着上述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张永军和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兼中国区全球市场业务主席李晶。

中国转型:

从世界工厂至世界市场

NBD:中国希望将经济发展模式从出口导向型转为消费内需型。这种转变会带来什么影响?

张永军:内需更多的是扩大消费。中国原来是世界工厂,未来向消费内需型转变之后,将从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变成主要的消费国,产业结构会发生变化,可能第三产业会占主导地位,中国的物流业和商贸服务业会变得特别重要。未来国内市场消费将会驱动经济增长。

NBD:中国目前的企业结构是房地产(行情专区)和能源等资本密集型企业打头阵,未来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张永军:中国未来需要大型的商贸企业,比如美国沃尔玛这样的企业。此外,我国的物流成本很高,未来也亟待改变。现在我国物流占GDP的18%左右,美国现在是8%左右。

李晶:中国经济现在分两部分,一部分发展很快,另一部分发展很慢,就是异速增长。比如重工业行业现在比较困难,产能过剩,而现代服务业展示出非常强劲的增长潜力。

多轮驱动:

改革红利待加速释放

NBD:中国经济转型的推动力在哪里?

一定的优势。

城镇化会是一个重要推动力,会创造出巨大的消费和投资需求,这个过程中农村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和二三产业,也会有大量的人员转移。从供给和需求来说,城镇化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

另外,我们还要加快经济发展战略调整,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并需要推动经济增长由生产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

李晶:现在中国的经济多靠投资拉动,转型到消费服务行业拉动的经济模式还需要一段时间。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容忍偏低的经济增长速度,所以在短期之内不会出台新的政策来刺激经济,中长期来看对经济增长是有好处的。

经济换挡:

区域和行业热土生变

NBD:我国未来区域格局将会如何演变?

张永军:我国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对较低,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产业的轻度转移,就可以带来效率的提高,而且一定程度上可以扩大中国的内需。

NBD:中国经济转型中,服务业和新兴产业前景如何?

李晶:最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支持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在未来5-10年会取代重工业和投资,成为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增长亮点。我们看好几个服务行业,一是电子商务,二是现代物流,三是旅行和娱乐行业,四是公共服务行业。此外,我们比较看好创新和战略新兴行业。2012年,这个行业研发投入投资总量达到1万亿元,占去年GDP的2%左右,未来投入人会越来越多。

“改革红利”三题

为什么说过去30多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

所谓改革红利,不仅包括我们所能预期到的通过制度改善所获得的经济收益,而且包括我们没有预期到的在国内外特殊条件下所获得的经济收益。比如,经济活力与改革前相比明显提高,居民生活与短缺条件下相比得到巨大改善。尽管我国经济发展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但不能否认的是,改革开放的30多年是我国近现代史上超预期增长的一页: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近10%的速度持续增长,2012年中国大陆(含香港)73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20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手机、电脑、轿车等高档耐用消费品进入寻常百姓家庭。这些成就包含着丰硕的改革红利。

改革能获得红利,得益于国内的人口红利和国际的经济全球化红利。过去30多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加,儿童和老人抚养比维持在较低水平。这种“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从国际看,我国改革开放之初,适逢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世界经济持续增长,全球贸易和投资规模稳定扩大,我们引进外资、扩大出口,分享了丰厚的经济全球化红利。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经济更有效地整合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充分地受到全球总需求的拉动。

事实上,我国人口红利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就已出现,但在“一大二公”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发展的活力不足,不仅释放不出人口红利,反而受到人口负担和就业的沉重压力。在“亚洲四小龙”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我国正处在封闭半封闭状态下,也没有分享到经济全球化红利。正

是改革开放使人口红利和经济全球化红利等各种潜在红利转化为现实红利,我国才能实现连续30多年的快速增长,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是过去30多年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

进一步讲,改革红利来自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有效性有机结合起来的重大的创新。一方面,市场经济创新着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生产力;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创新着市场经济,使市场经济从古典的个人利益至上走向更多追求社会福利和共同富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实践,是生成和释放改革红利的源泉。

为什么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改革仍是最大的红利

改革将推动新型工业化。我国工业化正处于中期阶段,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当前,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为重点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有专家预言第三次产业革命即将到来。我们只有加快推进科技管理、职业教育、人才激励、环保监管等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才能尽快摒弃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发展路子,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改革将推动全面信息化。信息传输、交换和利用的效率决定市场、社会和政府运作的效率,而信息传输、交换和利用的规范与安全则需要制度保障。这就凸显了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作用。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服务、改进管理、提高效能,既是行

政体制改革的目標，也是推進信息化的內容。

改革將推動健康的城鎮化。我國目前有2億多農村進城務工人員，將來還要有3億左右的農村居民進入城鎮，城鎮化的潛力十分巨大。積極穩妥地推進戶籍、就業、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土地管理等領域的改革，為農民工市民化創造有利的制度條件，就能夠促進城鄉發展一體化，促進城鄉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促進我國社會進入更高級的發展階段。

改革將推動農業現代化。實現農業現代化，要求提高農業組織化程度、改革農業生產經營體制。從總體上看，應在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同時，積極發展多種形式的規模經營，着力構建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社會化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通過改革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上策。

改革將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五位一體”總布局的落實。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加快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和生態文明，才能進一步理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經濟與文化、人與自然的關係，才能確保改革紅利在全社會的公平分享和永續利用。

可以說，改革是生成發展紅利的“活水”，是解決發展中突出矛盾和問題的“總開關”，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改善的“動力源”。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改革仍是最大的紅利。

新形勢下如何選擇釋放改革紅利的突破口

釋放改革紅利，不僅方向要對頭，而且要選准突破口。新形勢下如何選擇改革突破口？這裡提出三條標準。

意義重大。當前有很多關係全局和未來的重大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制度的改革完善。這就需要從眾多問題中抓住關鍵問題，並提出相應的改革思路。選擇關聯度高、帶動性強的改革，能夠牽一髮而動全身。這些關鍵問題已經充分反映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

共識程度高。改革到了“啃硬骨頭”、“涉險灘”、“攻難關”的階段，很多問題判斷與解決起來很複雜，難以較快達成社會共識。所以，應優先選擇社會共識程度高、阻力小、能實質性推進的大問題作為改革的突破口。

國際化程度高。中國的發展與世界日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中國的改革受到國際社會越來越高的關注，各種提法和舉措也得到越來越多的國際回應。我們在堅持中國特色的同時，也應考慮重大提法和舉措與國際接軌的問題，使之既來自中國自身的需要，也容易得到國際社會的理解與支持。

按照以上標準，可以考慮將“科學發展、綠色新政”作為近期改革的突破口。“綠色新政”是聯合國在2008年提出的，旨在解決環境保護、污染防治、節能減排、氣候變化等與人和自然可持續發展相關的重大問題。實行“科學發展、綠色新政”，有利於從改革資源性產品價格和稅費體制、改革環保監管體制等方面入手，更多地利用市場機制和社會組織開展環境保護和生態修復；有利於理順中央和地方及地方各級政府間的財政分配關係；有利於解決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中的可持續發展問題；有利於理順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關係。這些問題的解決，不僅能促使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也是推進較低成本、較高收益改革的過程，會形成新的改革紅利。

（人民日報 李曉西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學術委員會副主任）



改革红利让 海外资本市场 新宠儿 小贷公司成为



本报记者 梁薇薇报道

刚刚结婚两年的付建华(化名)从去年开始借贷给妻子娘家的一个熟人做项目,从中每月赚取10%的利润。他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说道,“但具体也不知道这人是做什么项目,因为都是熟人,没想多问,也没有签合同,所有的承诺都是口头协议。”

作为一种融资渠道,小贷公司在我国还处于起步期,制度建设相对滞后,普遍存在财务不规范、管理松散、风险管理不到位等问题。因此,信贷源绝大多数来自熟人的人脉,靠的是信用做担保。

正是这种依靠熟人关系做起的小贷公司,随着融资需求的不断庞大,深受资金困境,缓慢发展的迹象也越来越明显。

然而8月13日,江苏吴江市鲈乡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登陆纳斯达克,以每股6.5美元,融资890.5万美元的收获,让市场眼前一亮。鲈乡小贷上市首日小幅破发后,次日大涨将近95%,一度引爆海外市场投资者热情。

不属于国内金融系统的正规军,也不能吸储的小贷公司,“对于小贷公司而言,想要迅速成长,走向国际资本市场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中国银行(601988,股吧)国际金融研究所分析师李建

军说,鲈乡小贷公司作为中国首家在美上市的小额信贷公司,它的成功上市也说明了海外投资者的眼光,这是对中国市场的巨大认可。

李建军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宏观上来说,这是对中国改革抱有期望。“如果说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靠消费,而不靠投资拉动的话,那创新就很重要。而创新的主体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中小企业。他们有巨大的融资需求。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对海外投资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不仅如此,从目前小贷业务来讲,人们对于无抵押贷款、信用贷款风险高的认识正在慢慢改变。特别是2011年之后,银行在小微贷款的投放力度不断加大。以中国民生银行(600016,股吧)为例,在2012年末,民生银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超过3000亿元,几乎占了所有小微贷款公司的一半。

因此,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的零点研究咨询集团金融研究总监高中英认为,从业务本身来讲,国外股票市场还很看重业务利润的增长空间和未来发展的空间,所以鲈乡小贷会受到海外投资者的追捧。

当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可贷资金跟不上,因此,寻找外部的融资方式来支持业务发展,上市是其中一个很好的路径。但上市也对小贷公司的规范性提出了很多要求。

高中英指出,鲈乡小贷的上市成功有一个进步的示范效应。小贷公司还可以以上市为契机,不仅在上市筹备阶段就开始规范化商业行为,对未来发展战略提出可行性报道,才能通过上市。此外,在上市之后,还要按照商业准则去履行之前的承诺。这会给未来国内的小贷公司发展带来更加规范的管理和发展模式。

据媒体报道,在苏州近百家小贷公司中,鲈乡小贷并不算出众,根据金融办系统内部的评级,鲈乡小贷去年评级(2013年评级尚未出来)并非位于前列,处于一般的水平。但鲈乡小贷筹划上市之路已从2012年开始, (下转第10页)

王健林： 中国吃那小平改革红利已经 25 年 红利快结束了



大连万达董事长王健林

凤凰财经讯“中国吃邓小平的改革红利已经 25 年了，改革红利差不多结束了。”大连万达董事

长王健林在《财富》全球论坛接受采访时如实说。中国的新未来只有一个方向，就是下决心实行改革。如果不改革，中国就没有未来。改革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体制改革，一个是政治体制改革。

他表示，中国吃邓小平的改革红利已经 25 年了，改革红利差不多结束了。现在也形成了若干利益集团，国企、国资太强大了，这就造成我们创业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所以，目前中国需要一次下决心的、落到实处的改革，而且这个改革是实行自下而上的改革，放手让人民群众创造，管理层看着谁的好的推广谁的，而不是由顶层设计，由一批人，官员或者一批各个部委来设计怎么改革。

他说，他最担心改革由掌权的人来设计怎么改革。因为官员和部委设计的改革，不可能把自己改下去。比如说，现在全国的五个金融创新区，都没有试验出一点点的改革。因此，应该鼓励人民群众创造，让管理层推广，谁的好推广谁的。

(凤凰财经)

(上接第 9 页)此次上市成功也是经过一番准备的。

此外，“上市后规范性的操作，不仅可以降低可能会产生的系统性风险，而且规模也会做大。那么就会给人规范也能做得很好的印象。因此会引来

更多小贷公司效仿。”但同时，李建军也指出，并不是每个小贷公司都能做到。所以鲟乡小贷的上市成功可能也预示着小贷行业的重新洗牌，会把这个无序的竞争变为有序的竞争。

干部穿好“三双鞋” 才能服好务



新时期的乡村干部/当领导就是服务/干工作全为群众/办公室里随时准备着“三双鞋”/穿上皮鞋跑市场/为农业增收找门路/换上布鞋下村组/为农村和谐调纠纷/拎上胶鞋去田头、为农民致富传技术……一位在农村工作20多年、深受老百姓爱戴的基层干部感动了不少干部群众，2009年笔者有感而发写下了一首诗歌《基层干部》，在湖南新闻联播出了，这是其中的节选。时下，一些基层干部埋怨当前的农村和农民工作难做，感到自身威信难以在老百姓当中树立。从这位干部用“三双鞋”来真情服务基层，赢得了百姓的赞许中，我们能否得到一些启示呢？笔者觉得，这正是新时期做好群众工作的最好方式方法。

当前，农村尽管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经济发展不平衡、干群关系紧张等问题依然存在。如何服好务、解民难、促发展，是摆在基层干部面前的突出问题。基层难，做基层干部尤其难，基层苦，当基层干部尤为苦。笔者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曾经还在农村工作八年，对基层干部的苦楚深有感触，也十分理解、同情他们的难处。其实，想要解决以上问题并不难。笔者认为，只要基层干部穿好“三双鞋”走到百姓当中访民情、解民忧、帮民富，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要穿好“布鞋”下基层——访民情。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便添多少芬芳，说话就增多少分量。现在的农村生活条件虽已大为改善，但在老百姓心目中，布鞋才具有亲和力，老百姓更愿意与穿布鞋的干部打交道。要深入广泛开展“三问”活动，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所需，掌握农村的真实情况。

要经常穿上布鞋，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走进街头巷尾，走遍村村寨寨，走到农户家中，走近百姓身边。最重要的是必须放下架子，不打官腔，在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行动上为了群众。只有多进农家门，多说农家话，多察农家情，多做农家活，与群众打成一片，把群众当亲人，做农民知心朋友，才能获知更多的乡情民意，就能得到群众的理解支持。

要穿好“胶鞋”到一线——解民忧。阴雨冰雪天气在所难免，山路泥泞终会遭遇。在基层工作，不分春夏秋冬，无论晴天雨天，办理群众的事情贵在及时、迅速。一枝一叶总关情，百姓冷暖在心头。因此基层干部的办公室里要随时准备好一双雨鞋，当需要的时候及时穿上，迎头赶上。干部下基层，深入到一线，只有穿好了雨鞋，才能防腐蚀、防污染、防滑倒、防摔跤，也才能更好地做好工作，帮助群众解决难题。同时，如果干部经常穿着胶鞋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甩开膀子、扑下身子奋斗在田间地头、工地现场，组织他们修桥补路办水利，为老百姓办一件件好事实事，质朴、善良、重感情的群众就会从心里感激你、佩服你，积极响应你的号召，支持你的工作，其他工作就不难做了。

要穿好“皮鞋”跑市场——帮民富。基层情况千差万别，错综复杂，基层工作千头万绪，任务繁重。建设“美丽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实现“中国梦”，发展是硬道理，带领群众致富是关键是在、重中之重。一些山区地方是穷山恶水，发展经济困难；一些地方尽管有丰富的资源，却苦于没有门路。（下转第12页）

李瑞环总结 30 多年从政经验 对做官的“看法与说法”



“香港报纸说，天津市长出身寒微，从不避讳。这有什么避讳？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人，劳动创造一切，手不动就会僵直，脑不动就会萎缩。看不起劳动人民的人是一种最没知识、最不懂道理的人……我曾经当过木匠，现在阴差阳错地当了市长，我们是完全平等的。我觉得真正使人信得过、靠得住的还是干活的。”

这是 25 年前，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市长李瑞环在同天津市优秀环卫工人职工代表座谈时的一段讲话，也是亿万劳动者感到“最暖心窝子”的话。

李瑞环，这位木匠出身的国家领导人，有 30 多年的从政经历，自然有对做官独到的“看法与说法”。他那或语重心长的谆谆教诲，或声色严厉的殷殷忠告，或为一些问题的切切担忧，都令为政者警醒和深思。（以下楷体字为李瑞环的原话）

为官者的群众观——

“看不起劳动人民，这是社会道德上一种值得人们注意和警惕的不好的征兆”

李瑞环认为，当官就是“服务”，即为群众服务，必须有这个清醒的认识。1985 年 12 月 28 日，在天津市商业职工代表新年茶话会上，李瑞环专门对“服务”进行了解读。

如果讲服务业，我们这帮人都应该算“服务业”，因为领导就是服务，人人相互服务。有一位浴池的同志跟我说：“我这个行业很苦啊。天天伺候人。”我问他：“你伺候多少人？”他说：“人家洗澡来，我这一天得伺候 20 多个人。”我说：“你这个不行，我一天要伺候 800 万人。”他说：“我很苦。”我说：“你还不够苦，我吃饭的时候，还得有两拨人谈话，边吃边谈，夜里常常 3 点钟才能睡觉。说苦你还没我们苦。”我这不是表功，我是在讲这样一个道理，人人都在为别人服务，每个人都在被别人服务。因此就不应该轻视任何一个行业，因为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分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每个地方都重要。

李瑞环最讨厌那些看不起劳动人民，尤其是看不起环卫工人的人。他在一次讲话中对那些人进行了辛辣批评。

（上接第 11 页）这就亟需基层干部来引路，带领群众不找“市长”找“市场”，寻找一条适合当地经济发展的好路子。因此要求基层干部在当好一名干部、在好份内工作的同时，更要树立经商意识，做一个老板。要经常穿上擦得油亮的皮鞋，穿上整洁

笔挺的西装，外出招商引资，帮助农民搞好农产品销售。这样一来，农村发展了，农民富裕了，你的威信自然就高了，工作自然就好开展了。

（2013 年 6 月 13 日 求是理论网 吴展团 作者为湖南省怀化市司法局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

看不起环卫工人，看不起劳动人民，这是社会道德上一种值得人们注意和警惕的不好的征兆……我有一个老朋友叫时传祥（北京市掏粪工人，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开追悼会时，八宝山火葬场里边、外面都站满了人，不下一两千。而有些人自认为了不起，官是不小可并不被人们尊重。不管什么人，不管多清高的人，多为了不起的人，在化粪池里看，拉的屎是一个德性。有些人就是提起裤子不认账。看不起环卫工人的人是忘了自己也是拉屎的人。本来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个问题应该是解决得好的。为什么少奇同志接见时传祥？为什么周总理请时传祥去中南海？就说明问题。最近几年来，我看宣传上有毛病。知识分子是国家需要的，尊重他们、表彰他们，给予他们若干的待遇，宣传他们的重要作用和意义都是对的，但不要说别人不重要，你是重要，但是你拉了屎我给你掏了，重要不重要？要不然屎堆在屋里行吗？外地人都说天津真干净。没有环卫工人能行吗？宝元（即赵宝元）同志原来是公用局的副局长，当时天津没水喝，他跟我一起搞水。后来，我看他这个人正派有本事，调他到环卫局当局长。当时有人开他的玩笑说：“闹了半天，你当了一个屎头啊！”我说，这个认识不对。一个城市里，环境卫生这块工作搞不好，不行。要让大家的生活都方便有序，干干净净，心情舒畅，没有环卫这支队伍是不可想象的。

李瑞环一直非常关注民情民意，认为这是领导者做出一切决策和措施的依据。2002年全国两会期间，他就告诫大家要重视社情民意。

现在顺口溜很多，网上传闻很多。可以肯定地说，有若干个东西是没有的，但反映了一种情绪。“上山下水问渔樵，要知民意听民谣。”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重视民谣，特别是童谣。为什么是童谣呢？实际上是成年人编出来让儿童念的，儿童念出来不犯法。皇帝一听见童谣直接奔他来，就来个罪己诏。我们对顺口溜之类的东西也要重视。昨天总书记（江泽民）和我听一个委员讲，现在民间流传一副对子，上联是“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

成功”，下联是“下级骗上级，层层加水，水到渠成”，横批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类似的对子讲了若干。总之，对目前社会存在的各种情绪要重视，绝对不能麻痹大意，同时也要分析，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我们应该引以为戒的。



李瑞环书法作品

为官者的实干观——

“要少讲空话，多干实事，空话连野猪都骗不了，何况人呢？”

也许因为李瑞环自己就是从最基层干上来的，所以他特别强调官员的实干作风。1985年5月29日，时任天津市市长的李瑞环，就在《天津日报》上写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兴邦之道——再谈少讲空话，多干实事》。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有些同志沾染了一些很坏的风气，他们习惯于坐在屋子里，豪言壮语，气吞山河，听起来似乎决心很大，道理很多，但只有唱功，没有做功，嘴行千里，屁股在屋里。高谈使他们浪费了很多时间，阔论使他们耽误了许多事情。有些同志“茶碗一端，说话无边；香烟一点，专说人短”。他们习惯于说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就是不说怎么样才对；他们总喜欢说这人不行为，那人不行为，就是不说自己行不行；他们不当运动员，只当裁判员，只吹哨不上场，谁“进球”吹谁“犯规”；你在前边干，他在

旁边看，干好了他说“早该如此”，干错了他说“意料之中”。他们涣散了别人的斗志，污染了周围的空气，误事、误国、误人、误己，此患不除，四化难矣。

去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到北京市西城区主持召开一个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座谈会。会上，他讲了一个关于“空谈误国”的故事，把与会者都逗笑了。这个故事是他从尚未正式出版的李瑞环的《看法与说法》上读到的。其实，这是李瑞环1992年1月25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的一段话。

宣传思想战线的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事业心，作风要扎实，思想要艰苦，虚功要实做。要少讲空话，多干实事，空话连野猪都骗不了，何况人呢？

原来，湖北神农架地区野猪糟蹋庄稼厉害，群众叫苦不迭。乡村组织民兵驱赶，花费很多人力也不见效。后来有人想了个“高招”，用录音机录上狮、虎的吼声和人声、枪声，用高音喇叭播放，开始果然有效。但几天后，野猪试探着往庄稼地里凑，用身子靠靠绑喇叭的杆子，发现仍只是叫喊而没动作，就甩开嘴巴把绑喇叭的杆子拱倒了。当地人讲，说空话、唱高调连野猪都骗不了！

1994年10月，李瑞环在听取有关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曾引用李自成的故事说明形式主义的危害性。

实在地讲，现在形式主义的东西、没有实际意义的东西仍然不少。比如各种各样的节日越来越多。当然有些节日如国庆节以及一些民族传统节日等，庆祝庆祝，办得好一些，也属必要。问题是现在节日太多太滥，各地方有各地方的节，各行业有各行业的节，各种产品有各种产品的节，西瓜有西瓜节，橘子有橘子节，茶叶有茶叶节，花卉有花卉节，可谓名目繁多。民间传说，李自成进北京，本来该坐42年天下，结果他天天过节，把节日提前过完，42天就败退出北京。这说

明老百姓都知道天天过节是不祥之兆。节太多，庆祝活动、纪念活动太多，不必要的会议和应酬太多，使领导同志的时间被严重肢解，难以集中精力想大事、抓大事、办实事。而且每次活动、每逢过节都要花很多钱，助长了奢侈之风，群众对此反映强烈。所以，必须提倡领导干部塌下心来琢磨事，扑下身子干工作，不能整天处于应酬之中。



1990年4月28日，李瑞环（图中发言者）在人民日报社参加《人民日报》国内记者工作会议并讲话。

为官者的实事求是观——

“人总是有优点有缺点，有长处有短处，不能把自己的长处搁在脑袋上晃悠，把人家的缺点从屁股底下抠出来跟自己的优点比”

一个人、一个单位，乃至一个国家，在处理复杂、关键的问题时，固然需要丰富的知识，但更需要智慧与方法。李瑞环认为，一个好干部，不仅要有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还要有科学的工作方法，尤其是要把辩证法运用到工作实践中去，“处处都有辩证法”。

1990年4月28日，李瑞环在《人民日报》国内记者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了官员“言行要符合实际”的问题。

在天津工作时有人问我，讲话为什么那么难，准备了很长时间，人家还说听着别扭。我说原因有三：一是水平问题，像我当水匠的，叫我当市长，现在管意识形态，当然就难；再一个是由于问题重

大，需要慎重考虑，也比较难；还有一个是说的不是自己的话，不是怎么想怎么说，而是说违背本意的话，当然就困难，听的人也觉得别扭。我们是搞唯物论的，总是要力争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实际，但有时官越大越不容易符合实际。

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很多人往往在成绩和问题面前，不能保持客观对待的态度。这方面，李瑞环曾在2002年两会期间有过精彩的表述。

既要充分地肯定成绩，又要清醒地看到问题。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举世公认的。在公开场合，在群众中，在宣传报道里，要多讲成绩，多讲大好形势，以鼓舞士气，凝聚人心；但在党内，在党的领导干部中，在研究工作时，则要多谈问题，多看困难，多找不足，以保持清醒，作最坏的打算，图最好的结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最大的忧患是没有忧患意识，最大的问题是对问题缺乏警觉。毋庸讳言，我们现在确实面临不少问题，有些问题应该说还比较严重……比如说腐败问题。这些年我们下了很大的力气抓，杀人都杀到国家领导人一级了，但还是没有遏制住，有的甚至愈演愈烈，特别是贪污受贿的案子越来越多，涉及的钱数越来越大，职务越来越高，群众反映十分强烈，等等。我们许多在位的领导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在会上听到的都是“满台锣鼓响，一片赞扬声”，很少有谈这些问题和问题的严重性，谈问题怎么解决；很少有人说出这么多问题的原因在哪里，上下都有意见，谁也没有责任。长此以往，非出大问题不可。

在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上，李瑞环也总结了丰富经验。他特别强调，“团结稳定”是一切事业的基础，尤其是一个班子里的领导干部，要客观认识自己的优缺点，互相信诚相待。

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能在一起工作，真是缘分，有这么一段合作共事的历史，应该留下美好的记忆。人总是有优点有缺点，有长处有短处，不能把自己的长处搁在脑门上晃悠，把人家的

缺点从屁股底下掘出来跟自己的优点比；一个班子总有强一点的弱一点的，没有弱一点的也显不出来强一点的，你强是因为有弱一点的托着，相互可以取长补短才成其为班子；一个班子总是有文的有武的，一个乐队有吹管的、有拉弦的，但指挥就是一个人，大家都当班长、都来指挥，就没法办。所以我说，假如把12个省委书记弄到一个班子里，那这个班子肯定弄不好。



1982年10月11日，李瑞环（右一）参加京津工程渠开挖义务劳动。

为官者的用人观——

“对一起工作的人，乃至对自己的下级，当面对好好好，偷偷地跑到上边告一大状……决不能让这种人进领导班子！”

2010年，李瑞环出版《务实求真》一书，其中他讲到了一种怪现象，那就是有的单位用人制度不够透明，选拔干部时搞“帮派”。这次，在《看法与说法》里面，他又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阐述。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改变用人制度。一叫体制，二叫用人。体制也是人确立的。政治体制改革，说来说去是用人的问题。中国的改革，如果干部人事制度不改革，其他一切改革都靠不住……我们现在的干部人事制度从下边往上边看，透明度很低，掩盖物太多，搞得有些神秘化。为什么有些干部怕领导不怕群众，在领导面前唯唯诺诺，在群众面前什么离谱的话都敢说，什么离

谱的事都敢做，怕仆人不怕主人，就是因为他的命运在领导手里，吃谁的饭，当谁的官，拿谁的钱，把领导赏识和群众拥护看作两码事。要增强选拔干部的透明度，去掉笼罩在干部人事制度上的神秘色彩。要使我们的干部一开始就最大限度地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以利于群众发表意见，使群众到关键的时候能起作用。做到这一点，就是一大进步。

1987年11月29日，李瑞环在“推荐天津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人选”会议上，曾对一些选人用人方面的不良风气进行过深刻剖析。

现在社会上存在着一种歪风：有的人不干事却事儿很多，拉拉扯扯，吹吹拍拍，你长我短，一帮一派。我讲过领导干部要坚持“四人”：诚恳待人，平等待人，一视同仁，知人用人。领导之间有意见，可以当面讲，我最不喜欢背地里鼓捣人的人。和我打过交道的人知道我这个脾气，或者叫毛病。我讨厌告黑状的人，对一起工作的人，乃至对自己的下级，当面好好好，偷偷地跑到上边告一大状，有内容，有记录，很系统。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会先问他，你找他谈过没有？你批评过他了没有？那么作为你的同志、你的部下，你看到缺点不找他谈，不批评他、帮助他，跑我这儿来说这一通是什么意思？是证明你正派呢还是证明你忠于领导？我不反对向领导反映情况，但处事要处以公心，对同志要好心。同志之间有意见可以当面谈嘛，我们决不能让这种人进领导班子！对人总是要宽厚，总是要诚恳。待人以诚、以宽。其次是实实在在地干事。你说我们这个班子里边有多大的本事？没有。我出过一个题：两头骡子拉车快还是两头驴拉车快？毫无疑问，一般地讲两头骡子拉车快，力量大。我说未必——一个往前拉，一个往后拉，把车拉散了。小毛驴劲不大，但一股劲蹦蹦跳跳老往前走，一定比骡子快！

2002年2月，李瑞环在听取中央统战部汇报时所讲的一段话，对我们领导干部的用人观，也

是极有启发意义的。

我们执政50多年了，政权、军队都在手里，如果说还有那么多人反对你，就要认真想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举两个自己亲身经历的人和事。小靳庄过去很有名，这个村的支书在“文革”后期当了宝坻县的书记。粉碎“四人帮”后，人们批判他，他不理解，说“当初到县里来是你们让我来的，现在你们批我的那些理，我连听都听不懂”，说完话，拎起行李、骑上自行车就回家了。他以后在村里带领群众致富颇有成就，村里党员又选他当书记，有的人想不通，认为他是“三种人”（“文革”中靠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我问他是不是党员，既然是党员，既然是多数党员都选他，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同意？他当村支部书记后干得非常好。还有孙健，一个烧锅炉的，在“文革”中当了副总理，在位时也说了不少昏话。下台以后，他告诉别人，自己糊里糊涂地上去了，糊里糊涂地下来了，他也不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整党时，有人提出把他开除出党。我为此专门找了薄老，希望将此人留在党内。孙健本人深受感动，跑到天津市委组织部大哭了一场。这个人回到单位后同样干得很出色。我举这两个例子，想说明一个道理：许多人并不是鬼，是我们自己疑神疑鬼，结果把人变成了鬼。若干年来，在民族工作中，在其他许多方面，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1987年5月5日，李瑞环（右）参加天津平房改造工地义务劳动。

为官者的学习观——

“有些文章写得不好，不是词汇不够多、句子不够美，而是在鼓捣字儿上花的时间太多，在研究事儿上下的功夫太少”

李瑞环爱读书是出了名的，他不仅自己读书，也大力倡导干部们多读书。他认为，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的最大威胁。

1987年，天津召开了一个调查研究工作会议。会上，李瑞环介绍了自己的读书经验。

我体会最基本、最重要的是：硬着头皮去读，咬紧牙关坚持。就像古时读诗词一样，先会背诵，后解其义。这样做当然很苦，读书怎能不苦？自古以来都叫“苦读”，“寒窗苦读”，“梅花香自苦寒来”。只要你不动摇，不松劲，只要你能有“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精神，终究会迎来“蓦然回首”的新局面。要勤于善于思索，“学而不思则罔”。读不懂读不进的原因之一是缺乏思索。思维活动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表现，是获得理性认识必需的条件和过程。要坚持多思，学会善思，养成思索的习惯，这不但可以增进理解，还可以增加兴趣，增多学习的时间。要学会联系，联系实际、联系工作、联系生活、联系常见和熟知的事例去理解书中的内容……

读书和写文章是紧密相连的，李瑞环还就写文章的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我没有专门学习过写文章，现在也不能说会写文章，但我做过一些实事，研究和处理过一些问题，总觉得写文章与总结经验有密切关系……写文章讲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讲谋篇布局、遣词造句，但如果缺乏对生活实践的深刻了解，缺乏对实际问题的深入研究，言之无物，无病呻吟，也就无法写出具有“三性”的好文章。我们有些文章写得不好，不是词汇不够多、句子不够美，而是动机上、内容上、方法上有毛病，在鼓捣字儿上花的时间太多，在研究事儿上下的功夫太少。为

文章而文章，从文章到文章，这种方法，永远写不出好文章。

对于一些领导干部在讲话或写文章中出现的不好现象，李瑞环也提出了批评意见。

领导干部讲话、文章中引用一下诗词典故，可以画龙点睛、节省文字，用得好还可以提神，但过分地、刻意地花太多工夫去寻章摘句，没多大意思。我这里讲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一年中秋节和民主党派成员赏月，事前我也找了两段有关中秋的古诗，但到我讲话时，前面的人把我准备的诗都用过了。我说：“我找的几首诗，你们都用过了，我再重复背也没什么意思了。但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对我们这些日夜忙于实际工作的人，找、背几句诗很难，我想老百姓也不会希望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去查诗背诗，这不是我们的职业。但我们有专门从事这个行业的作家诗人，他们可以花点时间按诗词的描述对象分门别类地编一本书，或者叫词典。这样我们查找起来就方便了，他们也有活干了，岂不是两全其美！”后来还真编出了这样一本书，叫《古典诗词百科描写辞典》。这个书很受欢迎，印了很多次。序言里就是我前面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或者叫主业。领导人喜欢点历史、文学是好事，但不务主业，影响了本职工作，就变成坏事。历史上不务主业的人不少。当皇帝写诗最好的应该是南唐后主李煜。作为一个皇帝，他的诗放到诗人里边或用现在标准看也算好的。但是，他垮台了，被俘虏了。中国还有个皇帝喜欢唱戏，就是唐明皇，梨园就是从他那儿说起来的，到今天唱戏的祖师爷还是唐明皇。最后怎么样呢？连老婆都保不住，自己跑到四川去了。还有个皇帝喜欢写字画画，这就是宋徽宗，字写得好，画也画得好，在中国书画史上很有位置，现在卖得也很贵，结果怎样呢？把国家搞垮了，自己也当了俘虏……我不是说领导干部查书背诗不好，而是说领导的时间有限、宝贵，比这重要的事多着呢！

（环球人物）

媒体揭秘

给中央领导信件如何进中南海

今年“五四”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给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09级本科团支部全体同学回信。在过去几年，习近平不止一次通过回信的方式与普通群众和基层干部互动，收到回信的有农民工子弟、地震灾区的小学生，还有身患疾病的乡镇党委书记……

群众来信是怎么送到国家领导人手里的？中南海里的信，又是怎么寄出来的呢？

与中国政治最核心地带中南海仅一墙之隔，一个灰白色调装饰的邮局安静地伫立在府右街乙27号。

府右街上，行人们的视线很容易被中南海门口的警卫岗楼和站岗式武警所吸引，极少有人注意这家距离中南海西门不足百米的邮局。充满古旧味的办公室，营业厅墙上悬挂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标准照，宫廷样式的照明灯让这家邮局与中国邮政遍布全国的营业网点风格迥异。



从简单的送信送报到储蓄汇款，从只为中央领导服务到面向社会大众开放，如今的中南海邮政局看上去已经和其他普通邮局没有太多差别了。但是众多寄往中南海的信件都汇集到这里，作为沟通普通百姓与中央领导的一个驿站，中南海邮局仍然在书写着传奇。

“中央收发室” 走下神坛

“中央领导的信函只能通过这里投递。”中南海邮政支局党支部书记王磊强调他所服务邮局的特殊性：“中南海支局仍然是为中南海提供投递服务的唯一单位。”除此之外，邮局也为中南海内工作人员提供一系列个性化的服务，比如中南海内部警卫员每年换岗离开时，这家邮局被指派协助打包、运输行李。

据王磊介绍，自1997年面向公众开放后，中南海邮政局一半的业务量都来自社会公共服务。

开放的过程并不容易。

上世纪60年代，出于安全考虑，中南海内的一些机构和住户开始往外迁。小卖部、银行，甚至国务院的一些部门都逐步迁出红墙。邮局迁出的问题，被提上了讨论议程。时任中南海邮局负责人的李振才感觉到，随着中南海机关变少，邮局的业务将会大量减少，似乎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于是，他主动提了一个方案：如果组织需要，邮政局也搬出中南海。

谈到离开红墙，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流

露出眷恋的神色。他在中南海工作生活的那11年，是他人生中最开心、最自豪的时期。

上世纪60年代末，中南海邮局搬出红墙，不再归北京市邮政局直管，而由北京市邮政局西区邮局接管。作为老员工，尚元清对迁址没有特别的感觉——“邮局依然不挂牌，不对外营业，不和附近居民打交道，职员们吃饭、洗澡、参加文体活动，都在中南海里面进行……服务业务也依旧专为中央服务。上级指示：只是办公地点变，其他的关系都不变。”

中南海邮局只服务中央党政机关的状态止于1997年。那年，北京西区邮局决定，将这家特殊邮局的服务对象从中南海里扩展到普通公众。经过全面装修后，邮局所在的四合院恢复了古色古香的样貌，“中南海邮政支局”的铭牌总算被挂了出来。在府右街关门闭户近30年的中南海邮局突然一跃出现在公众视线之中。

“邮政局门口的这块铭牌很有意义。”王磊说，这是中南海邮局第一次明确地告诉外界，自己姓甚名谁，“首长和群众都是我们的顾客”。为此，邮局工作人员的人数一下多了一倍。

邮递员上岗前要经严格政审

“三四点起床、摸黑赶去20公里外的人民日报社取报纸，然后再到涪河邮电局交接邮件，十点钟前后返回邮局。”中南海邮局的元老级交通员付江海回忆，他的“公车”——一辆自行车，每天都堆满了报纸和信件。单是《人民日报》就有200份，未经折叠就被分为四卷卷起，整个报卷有半米多长。老乡见到他常打趣：“嗨，比小驴子驮的还多呢。”

讲中南海邮局的历史，要追溯到1948年，那时专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和首长们服务的邮政局叫“山河邮局”。一般而言，邮戳都是地名，但当时晋察冀边区历史上并没有叫“山河”的地方。之所以用这个名字，其实是为了保密，山河邮局分别取的是平山的“山”，和流经平山县的滹沱河的“河”。

1950年，党中央机关进京，这家邮政局一路跟随着毛泽东等领导人来到香山临时驻地，而后搬入了中南海，成了中国最神秘的邮政局。

李振才在那儿工作了11年，他记得邮政局入驻中南海后被设置在西营业处，距离西花厅不足百米。“在这个邮局工作的员工都是邮政系统的业务骨干，每位邮递员上岗前都必须经历严格政审和保密培训。”

邮局自1959年2月开始在中南海营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属于中南海的内设局。从各地寄给党中央、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信件、邮包和报纸杂志最终都会被发到这里，盖上“中南海”的落地邮戳，才能被投递到各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领导的家庭邮箱。

邮局的老人们回忆，在红墙内办公时见到中央领导是常有的事。老员工尚元清记得，当时周恩来住的西花厅就在邮局办公室附近，他和邓颖超时常来邮局和李振才等人聊天。

当然，中南海邮政局也有自己的“家规”。尚元清回忆，第一“规”是，在中南海里骑自行车投递时，看见首长必须下车，在路上看见首长散步或开会回来，不要主动和首长讲话。“看见毛主席要避让”。

李振才说：“当时普通邮局每天递送3次，邮递员都必须身着邮政系统定制的统一制服。但中南海里的邮局，按照首长们的工作作息，每日早晨八点、下午三点投递两次，邮递员不用穿制服，大家都喜欢穿与中南海工作人员风格一致的军大衣上班。”

让李振才自豪的还有，投递员拥有中南海最高级别的通行证，哪里都能去，通行范围比很多领导人都要大。

中南海里的邮件谁来转

如果你贴上80分邮票，写上“中南海”里领导人的名字，信首先会到达中南海邮局。在中南

海邮局后边那所小四合院里，几株石榴树、海棠树生机勃勃，工作人员则时常围着一大摞码放整齐的邮件忙活。这些都是中南海里的邮件。行政和警卫人员有时会自己到前台交寄一些零星的信件。大宗邮件都是由邮政专车定期到中南海里去拉，并于当天全部发出。对于一些小批量的重要邮件，会通过专门的渠道和最高规格的服务，来确保万无一失。

中南海邮政支局支部书记王磊解释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邮政局首先会按照来信者身份是机构还是个人粗略对邮件进行分拣。机构公函一般直接投递给相应对口单位，而个人来信则根据收信人身份区分送至国务院和中央办公厅的两个信访室登记处理。”这两个信访室于2000年升级为国家信访局。

在国家信访局办公大楼的四楼，有间“信件分拣室”，十几平方米的屋内，放着几麻袋已经消过毒的信件。分拣员从麻袋中拿起一摞信件，在桌子上顺几下，放到拆信机上，拆封后再放到各省的信件格子里，几位年轻的分拣员一干就是一上午。这些经过初次分拣的信件再汇集到另一间办公室，按照涉法涉诉、城乡建设、农业农村、劳动社保、组织人事等几个方面，再次进行分类调度。分好后，其他业务处就可以将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信件取走，按照相关规定认真及时处理。

最终，一些信件可能到达相关领导的秘书处，再递给中央领导。据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主管的《秘书工作》杂志记载，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的田家英会筛选出重要的群众来信，供毛泽东批阅，其余由他代为回复。但即便是毛泽东自己手写的回信，田家英也会重新誊抄一遍再发出，把原稿留下。

“人民包裹”包罗万象

作为庙堂与江湖的连接点，中南海邮局的工作对写信者而言意义重大。高元清说起一封1959年

6月的人民来信。当时，这封信署名为“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北安路小学四年级二班王刚”的信件同众多群众来信一起被投送到了中南海信访处。

几十年后，已是著名演员、主持人的王刚说出了这封来信故事的后半部分。当年作为小学调皮捣蛋的坏典型，王刚被周围的同学孤立了。为了排解内心的孤独和无助感，他决定给毛主席写信，并随信附上了两张自己画的水彩画。

十几天后，王刚突然被叫到校长办公室。他拿到了一个信封——里面有毛主席亲笔签名的标准照和回信。

回忆这段奇特的经历，王刚说：“忽然，我在人们眼中的印象一下子变了，各种赞扬声不绝于耳，然后我成了一个好班长、一个两道杠的少先队中队长……这封信改变了我的一生。”

一封写着“中共中央大胡子首长收”的来信也让李振才印象深刻。虽然周恩来总理在民间被称为“大胡子”，但分拣时，这封信是否应该交给国务院工作人员仍使他非常纠结。

“本着最大程度传达民意的想法，我递送了这封‘怪信’。”李振才说，几天后，有人告诉他，那封“大胡子”来信帮助周恩来找回了长征途中失散几十年的老友。

上世纪60年代，很多群众喜欢写信向党中央报喜。“分拣来信时，发现大家都喜欢用红色信封，一看就是报喜信，那时每次分拣来信都是满眼红彤彤的一片。”

除了寄给领导人或国家机关反映问题、报喜的信函外，很多群众还会向中南海邮寄各种包裹。李振才工作的11年间见过各式各样的“人民包裹”，从芒果、猕猴桃等时令水果，到群众自己制作或者精心挑选的衣物、书籍，包罗万象。

这些信件、邮包，经过粗略分拣后，机构公函会投递到相应对口单位，个人信件则送到信访局。“只要有收件人写明寄给领导人，我们也都会投递给信访部门。”

（解放日报）